

# 尴尬的气候大会

文 / 本刊记者 赵卉寒

当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将愤怒砸向各个碳排放大国领导人而遭受全球非议的时候，一场举步维艰的气候大会为格蕾塔的“控诉”又添了一笔佐证材料。

原定于2019年12月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联合国气候大会），因智利国内地铁票涨价引发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而不得不更换举办国，这给本届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随后，西班牙马德里的“接盘”让本届大会主席智利环境部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松了一口气。然而，在为期12天的会议议程中，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团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减排协议，这一结果让人失望，同时也替格蕾塔“啪啪”打了碳排放大国的脸。

激进派环保少女格蕾塔的愤怒不是没有原因。

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2019年碳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指出，即使当前《巴黎协定》的所有无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C，从而带来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气候影响。全球的整体减排力度须在现有水平上至少提升5倍，才能在未来10年中达成1.5°C目标所要求的碳减排量。

而可悲的是，在《碳排放差距报告》连续发布的十年间，全球碳排放量始终处于上涨趋势。

好吧，那让我们来看看全球碳减排意见无法统一“卡壳”在了哪里。

根据CNN报道，此次大会最受关注的就是《巴黎协定》第六条碳排放市场机制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在2018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就已初露端倪。在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上，200多个国家就减排问题如期达成了长达150多页的实施规则手册，但其中最重要的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问题没有讨论出结果。

“碳市场”和“碳交易”首次出现在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中。根据议定书内容可知，世界各国有四种减排方式可循。第一种，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第二种，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第三种，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第四种，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部分专家和环保人士认为可以“买卖”和“交易”碳排放量这一规则，可能本身就是错的。以第二种“净排放量”来看，高碳排放量国家很可能通过投资造林计划或可再生能源项目来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而其本质上并没有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

在2019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巴西政府就极力反对制定明确条款来防止重复计算，希望利用其国内大面积的雨林得到双倍的“碳信用”（即碳排放交易单位），并且保留其在《京都议定书》规则下积攒的大量尚未使用的“碳信用”，但欧盟等发达国家认为此举存在不透明、重复计算等问题。

此外，《京都议定书》的第三条内容也颇为值得深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减排，最终是否会沦为发达国家用金钱来换得发展中国家的“碳信用”？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项目副主任Satyajit Bose在本届大会上表示：“碳交易的市场规则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规则总比错误的规则要好。”